

## 《〈册府元龟〉新探》序

刘乃和

《册府元龟》是宋朝四大部书之一，它和《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都是北宋时编写，除《太平广记》为五百卷外，其余三部各一千卷，后世称此四书为宋朝四大部书，或宋四大书。

四部书中，《册府》载史事，《御览》载百家，《英华》载文章，《广记》载小说。四部书以《册府》为最大。它也是清《四库全书》中最大部书之一，属第二位，库本共27,269页，仅次于《佩文韵府》。《佩文韵府》卷数虽为444卷，但库本页数为28,027页。

宋四大书中，只有《册府》是宋真宗赵恒朝编写，余三部都是宋太宗赵炅时所编。真宗就是因他父亲时编了三部大书，所以他即位后也想编写一部大书和他父亲媲美，正象他自己在《册府元龟序》里所说的：

太宗皇帝始则编小说而成《广记》，纂百氏而著《御览》，集章句而制《文苑》，……洪猷丕显，能事毕陈，朕遵先志，肇振斯文。

于是他在即位后的第八年，即景德二年（1005年）九月廿二日“载命群儒，共司缀缉”，乃命资政殿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杨

亿等修一部书，他说这部书所包括的内容：

粤自正统，至于闰位，君臣善迹，邦家美政，礼乐沿革，法令宽猛，官师论议，多士名行，靡不具载。

时间是自上古至五代。修这部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用存典刑”，“欲著前代事实，为将来典法，使开卷者动有资益”。（以上引文均见《续通鉴长编》卷62）。书名初拟为《历代君臣事迹》。

编修人员，除王钦若、杨亿“总其事”以外，最初参加撰写的人有：钱惟演（《宋史》卷317。以下皆《宋史》卷数）、杜镐（卷296）、刁衍（卷441）、李维（卷282附见兄《李沆传》）、戚纶（卷306）、王希逸（卷268）、陈彭年（卷287）、姜輿（《宋史》无传）、宋贻序（卷264，附父《宋琪传》）、陈越（卷441）等十人，不久又特派内臣（太监）刘承规（卷466）、刘崇超（《宋史》无传）专门典掌其事。后又加入秘书丞陈从易（卷300）及刘筠（卷305）、查道（卷296）、王曙（卷286）等四人，最后增加直集贤院夏竦（卷283）。另由职方员外郎孙奭（卷431）注撰《音义》。以上二十人只二人《宋史》无传。

其《音义》已佚。

编撰共用八年时间，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八月书成。

这部书是一部类书，全书分为三十一部：

|          |         |          |
|----------|---------|----------|
| 帝王（128门） | 闰位（78门） | 僭伪（37门）  |
| 列国君（40门） | 储宫（17门） | 宗室（42门）  |
| 外戚（23门）  | 宰辅（41门） | 将帅（106门） |
| 台省（29门）  | 邦计（29门） | 宪官（15门）  |
| 谏诤（6门）   | 词臣（8门）  | 国史（13门）  |
| 掌礼（9门）   | 学校（15门） | 刑法（9门）   |

|            |            |             |
|------------|------------|-------------|
| 卿监 ( 15 门) | 环卫 ( 9 门)  | 铨选 ( 8 门)   |
| 贡举 ( 10 门) | 奉使 ( 17 门) | 内臣 ( 16 门)  |
| 牧守 ( 42 门) | 令长 ( 21 门) | 官臣 ( 11 门)  |
| 幕府 ( 16 门) | 陪臣 ( 21 门) | 总录 ( 241 门) |
| 外臣 ( 34 门) |            |             |

每部前有总序；部下分门，共一千一百多门，每门有小序。各门的材料，按时代先后排列。

《册府》和《御览》同是类书，但有很大不同：

《御览》以蜀、吴、十六国、宋、齐、梁、陈、北齐为偏霸，置《偏霸部》，秦与东魏、北周入《皇王部》。《册府》则以秦、蜀、吴、宋、齐、梁、陈、北齐、东魏、朱梁为闰位，十六国及五代之十国另立《僭伪部》。同是北宋官书，看法也不一致。

《御览》采引范围较广，“正史”之外，无论经、子、集、实录、起居注、小说、笔记、传记、论说、文集、地志、道释，以及古诗、古赋、铭、箴、杂书，尽都采用，引书近二千多种，所引古书，十之七八今已失传；且每条都注明出处，便于引据，因此校讐、辑佚家把它看为一座材料的宝库，向为学者重视。《册府》采引范围较《御览》小，其材料大抵以“正史”为主，间及经、子，不采说部。这个采引的原则是真宗所规定的，他在景德四年（1007年）九月戊辰曾对辅臣说：“所编《君臣事迹》，盖欲垂为典法，异端小说，咸所不取。”因为是要“垂为典法”，因此杂史、小说等，一概不采。所以总理编书事务的杨亿认为：

群书中如《西京杂记》、《明皇杂录》之类，皆繁碎不可与经史并行，今并不取，只以《国语》、《战国策》、《管子》、《孟子》、《韩子》、《淮南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氏外传》与经史俱编。历代类书，《修文殿御览》之类，采摭铨择。

这是两部类书的主要不同之处。

宋洪迈《容斋四笔》卷十一，记载《册府》编修官向真宗上言，谈到引书范围：

近代臣僚自述扬历之事，如李德裕《文武两朝献替记》、李石《开成承诏录》、韩偓《金銮密记》之类，又有子孙追述先德叙家世，如李繁《邺侯传》、《柳氏序训》、《魏公家传》之类，或隐己之恶，或攘人之善，并多溢美，故匪信书。并僭伪诸国，各有著撰，如伪《吴录》、《孟知祥实录》之类，自矜本国，事或近诬。其上诸书，并欲不取。余有《三十国春秋》、《河洛记》、《壶关录》之类，多是正史已有；《秦记》、《燕书》之类，出自伪邦；《殷芸小说》、《谈薮》之类，俱是诙谐小事；《河南志》、《邠志》、《平剡录》之类，多是故吏宾从述本府戎帅征伐之功，伤于琐碎；《西京杂记》、《明皇杂录》，事多语怪；《奉天录》尤其是虚词。尽议采收，恐成芜秽。

他提出举凡臣僚自述扬历的，子孙追述先德的，和僭伪诸国的书，都不取。或书中内容正史已有，或出自伪邦，或记载诙谐小事，或伤于琐碎，或事多语怪以及书中尽是虚词的，也都不采用。这个意见，是按真宗心意讲的，所以真宗听后，对这些意见，“并从之”。

这两部类书引用书籍范围如此不同，所以北宋袁氏《枫窗小牍》认为《册府》：“开卷皆目所常见，无罕覩异闻，不为艺林所重。”和袁氏同时稍后的洪迈也说：“其所遗弃既多，故亦不能暴白。”洪迈并举《资治通鉴》为例，认为司马光就曾利用了《册府》所摒弃的很多材料，所以记载史事，能够“本末粲然”。他说：

如《资治通鉴》则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

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争，用《谏录》；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邨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偓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讨裘甫，用《平剌录》；记毕师铎、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皆本末粲然，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

可见《册府》成书百年之后，就已有有人对其仅采“正史”，不采杂书，提出不同看法。就是因为这个原故，所以前人多不重视《册府》，正如陈援庵师所说的，“前人每重《御览》而轻《册府》，……明末诸儒如顾炎武等对《册府》尚不断引用，其后致力者遂稀”。

宋真宗对《册府》的编撰，异常重视，编撰的八年中，他时作指示，不断过问。书编完进呈后，他还亲自撰序，并赐名为《册府元龟》。元龟意思是大龟。古人用龟占卜，可知未来，故认为可以作借鉴的事，常谓之龟鉴。书名为《册府元龟》，即说这部书是一部为君臣鉴戒的古籍大书，并可作将来的典法。他还曾说这书不但是为了“听政之暇，资于披览”，而且是“欲区别善恶，垂之后世，俾群臣父子有所戒鉴”。所以他对这书的编撰，从未放松，编书刚开始，就抓全书的篇目工作。《续通鉴长编》卷61有：

初令（钱）惟演等各撰篇目，送钦若暨亿参详，钦若等又自撰集上进，诏用钦若等所撰为定，有未尽者奉旨增之。

他时常亲自“车驾幸编修之所”，以检查督促，并作指示。除篇目外，对其凡例、门类、内容、引书范围、编排次序、增删取舍等事，无不过问。据《续通鉴长编》卷65、66：

景德三年四月丙子，幸崇文院观四库图籍及所修《君臣事迹》，偏阅门类，询其次序，王钦若、杨亿悉以条对，有伦理未当者，立命改之。谓侍臣曰：“朕此书盖欲著历代事实，为将来典法，使开卷者动有资益也。”赐编修官金帛有差。（并见《玉海》54《景德册府元龟》条）。

景德四年八月壬寅，上幸崇文院观新编《君臣事迹》，王钦若、杨亿等以草本进御，上徧览之。入四库阅视图籍，谓宰臣曰：“著书难事，议者称先朝实录尚有漏落。”亿进曰：“史臣记事，诚合详备，臣预修《太宗实录》，凡事有依据可载史册者，方得记录。”上然之。赐修书官器币有差。

关于如何对待引用旧史，编修官提出自己的看法，上报真宗，真宗也有具体意见。《玉海》卷54载：

王钦若以南北史有索虏、岛夷之号，欲改去，王旦曰：“旧史文不可改。”赵安仁曰：“杜预注《春秋》，以长历推甲子多误，亦不敢改，但注云日月必有误。”乃诏：欲改者注释其下。

王旦，《宋史》282有传，真宗宰相。太宗时曾参加编写《文苑英华》。赵安仁，《宋史》287有传。善文艺，精书法，“尤嗜读书，所得禄勋，多置典籍，手自讐校。近朝沿革、衣冠人物，悉能记之。喜诲后进，成其名事，当世以重德推焉。”（续通鉴长编》卷78）。国子监刻《五经正义》板本，就是他所书写。真宗朝，曾参加重修《太宗实录》。王、赵二人都是当时擅长文史、德高望重的人。他们没有参加编撰《册府》，但都曾对《册府》的编撰提出过意见。这次真宗就是根据他们所提的、关于引用旧史时“史文不可改”的意见，真宗认为恰当，所以特下诏申明“欲改者注释其下”，以为修书时的准则。

每部的总序，每门的小序，原来由编修官分别撰写，后来

真宗认为序出众手，体例不一，自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丙午开始，遂择李维、钱惟演、刘筠、夏竦、陈彭年等六人撰写，撰后交杨亿审定。据《玉海》记载：

景德四年九月戊辰，上谓辅臣曰：“观所著篇序，援据经史，颇尽体要，而诫劝之理，有所未尽也。”钦若等曰：“自纂集此书，发凡起例，类事分门，皆上禀圣意，授之群官，间有凝滞，皆答陈论。今蒙宣谕，动以惩劝为本，垂世之急务也。”

看来真宗对序文的编写还是满意的，但同时也提出他认为不足的地方，就是要他们在序中进一步加强贯彻此书编写的主要精神，也就是要加强“诫劝之理”。

真宗不仅对编书经常作一般的指示，而且对某些具体取材、编排，都提出过修改意见。

他曾看见《唐实录》中记载唐敬宗即位后，坐朝常晚，刘栖楚切谏，而《实录》因为刘是李逢吉党羽，把刘看作是李的鹰犬。真宗则认为刘栖楚是谏臣，应当奖励，《实录》批评不当。因此又结合此事对编修官提出修书应区别善恶的意见。《续通鉴长编》卷65记载此事：

景德四年四月丁丑，上谓王钦若等曰：“近览《唐实录》，恭宗即位，坐朝常晚，群臣班于紫宸殿，有顿踣者。拾遗刘栖楚切谏，叩龙墀不已，宰臣宣谕，乃退。恭宗为动容，遣中使慰劳。谏臣举职，深可奖也。而史臣以逢吉之党，目为鹰犬，甚无谓也。今所修《君臣事迹》，尤宜区别善恶，有前代褒贬不当如此类者，宜析理论之，以资世教。”

所记恭宗，即敬宗李湛，宋讳“敬”称“恭”。今此事已改在卷548《谏诤部·强谏门》，就是按着真宗的意见安排的。

又如《续通鉴长编》卷67，记载真宗在景德四年时，看到

《崇释教门》中收采两件事，认为应当删去：

景德四年十一月癸酉，上谓王钦若曰：“《君臣事迹·崇释教门》，有布发于地令僧践之，及自剃僧头以徼福利，此乃先道惑溺之甚者，可并刊之。”

今《帝王部·崇释氏门》已将此二事删去。

又，关于三国时魏将张杨事，真宗也提出过意见。张杨，东汉末人，建安元年拜大司马。《三国魏志》八《张杨传》注引《英雄记》曰：“杨性仁和，无威刑。下人谋反，发觉，对之涕泣，辄原不问。”编修官列此事于《将帅部·仁爱门》，真宗看后，认为张杨这样做不对，“凶谋发觉，对之涕泣”，这算什么将帅之才？应该说这是“不察有罪”，怎能称为仁爱？《续通鉴长编》卷73：

大中祥符三年五月辛巳，内出手札示编修《君臣事迹》官曰：“张杨为大司马，下人谋反，辄原不问，乃属之《仁爱门》，此甚不可者。且将帅之体，与牧宰不同，宜威禁暴，以刑止杀，今凶谋发觉，对之涕泣，愈非将帅之事。春秋息侯伐郑，大败，君子以为不察有罪，宜其丧师。今张杨无威刑，反者不问，是不察有罪也。可即商度改定之。”

于是把张杨的事，自《仁爱门》中删去。今《仁爱门》无此事。

这书的编写工作，是随时编辑，随时进呈，真宗亲自审阅，遇有不妥处，随时指示，随时修改。真宗或提出书面诘问，或宜召编修官进宫，当面商谈，或下手札作指示。

《玉海》卷54有：

景德四年十月癸亥，上谓辅臣曰：“朕每因暇日阅《君臣事迹》草本，遇事简则从容省览，事多或至夜漏二鼓乃终卷。”

日进草三卷，帝亲览之，摘其舛误，多出手书诘问，或召对指示商略。（大中祥符二年）三月丁卯，诏或有增改事，标记覆阅之。

每日进草本三卷，真宗一般是当日把它看完，甚至有时看到深夜。“日进三卷”的办法，他也是从他父亲太宗那里学来的。

《玉海》54《太平兴国太平御览》条说：

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庚辰，诏史馆所修《太平总类》一千卷，宜今日进三卷，朕当亲览焉。自十二月一日为始，宰相宋琪等言曰：“天寒景短，日阅三卷，恐圣躬疲倦。”上曰：“朕性喜读书，颇得其趣，开卷有益，岂徒然也。”

《太平总类》书成后改名《太平御览》。宋太宗朝编修《太平御览》时，就是命史馆日进三卷，太宗亲自审阅。一千卷的书，日进三卷，也要看一年的时间。宋琪是参加编《册府》的编修官宋贻序的父亲。

真宗对此书的编写抓得这样细、这样紧，所以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八月十三日书成时，编修官所上的表中说：

推明分例，分别部居，皆仰禀于宸谟，惟奉遵于成宪，刊除非当，隐括无遗，每烦乙夜之览观，率自清衷而裁定。

这确是修书时的实际情况。

书刻了两年，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刊成呈进。天禧四年（1020年），真宗将此书赐辅臣各一部。

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时，真宗曾下令，说“妇人事别为一书”，不必放在《册府》，所以《册府》三十一个部里，不单列妇女。等《册府》修成，仍派王钦若主持编写后妃妇女事。大中祥符八年修成，是年闰六月庚辰，王钦若进上

“奉诏编修”的《后妃事迹》七十七卷，真宗赐名《彤管懿范》。编法同《册府》，共六部，一百四十门，王钦若撰序。《宋史·艺文志》著录子部类事类，作七十卷，《目录》十卷，《音义》一卷。此书今已佚失。

真宗子仁宗赵祯喜读《册府》以为鉴戒，但因卷帙太大，命人又编一摘录本，据《玉海》记载：

乾兴初，命翰林侍读学士晏殊等于《册府元龟》中掇其善美事，得其要者，四十卷，为二百一十五门，名曰《天和殿御览》。仁宗尝谓辅臣曰：《天和殿御览》可命校定模本刊行之。因言朕听政之暇，于旧史无所不观，思考历代治乱事迹，以为鉴戒。

乾兴原为真宗年号（1022年）。是年二月，真宗病逝，其子赵祯即位，是为仁宗，年号未改。翌年改元天圣。天和殿是禁中藏书之所，故书名《天和殿御览》。此书为仁宗即位后编写，约二年编成。天圣二年（1024年），五月甲寅，下秘阁镂版。晏殊作序。晏殊，北宋前期词人，《宋史》311有传。此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于子部类事类，今佚。

真宗不但对书的编写工作和书的内容过问很细，而且对参加编修的人，也特别重视和优待，不断奖励，赐钱赐物。

编撰人名为“编修《君臣事迹》官”。保证他们的修撰时间，对他们的起居饮食都有特殊供应，并派专人管理。有的编修官还得到升级或增加月俸，以资鼓励。据《续通鉴长编》卷61记载，在景德二年九月丁卯，刚刚开始下令修书时，就对编修官的生活等工作做出具体规定：

令宫苑使、胜州刺史、勾当皇城司刘承珪，内侍高品监三馆秘阁图书刘崇超典掌其事，编修官非内殿起居当赴常参者免之，非带

职不当给实俸者特给之，其供帐饮饌，皆异于常等。

如前面所引的记载，每次真宗亲临崇文院看编书情况后，都分别赐给编修官金帛、器币。有时还对个别人单独有赏赐。《续通鉴长编》卷62说：

景德三年正月癸酉，赐编修《君臣事迹》官太仆少卿、直秘阁钱惟演等菹菹。旧制，方物之赐，止及近臣，至是，优礼此职故也。

菹菹即肉菹菹，是生长在我国西北等地的补药。方物即土特产。为了优礼编修官，不惜打破旧制，以方物赐赏他们。此外，对修书勤奋，而俸银低的编修官，每月增加俸钱。事见《续通鉴长编》卷66：

景德四年八月，诏编修《君臣事迹》官秘书丞陈从易、著作佐郎直史馆陈越、大理评事秘阁校理刘筠，月增给钱五千，以从易等修书服勤，而俸入比同僚尤薄故也。

对那些工作又好、俸入又低的人，提高俸钱，让他们能安心工作。

有时真宗召见编修官，和他们对坐闲谈，作歌赋诗，君臣唱和。诗作得好，即有赏赐。《续通鉴长编》卷74载：

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壬辰，召资政殿大学士向敏中、龙图阁学士杜镐、直学士陈彭年、待制张知白、孙奭、查道，泊编修《君臣事迹》官、监察御史陈从易、大理寺丞秘阁校理刘筠对于崇政殿，命坐，上顾敏中等曰：“从易等屡进文字，皆有可观。”因命笔砚，令即席赋瑞雪歌、祀汾阳诗。上命题，彭年笔授。即进，上览之，曰：“筠辞采颇贍。”并赐绯鱼。

这次共召八人，六人是参加编修《册府》的。

真宗很注意编修官工作的勤惰。为了便于了解他们的工作质量，随时检查，“遇有差误，是谁编写就由谁负责，谁有差误就记在谁的名下，以便考核，按优劣等第奖励。《续通鉴长编》卷67有这方面记载：

景德四年十二月乙未，手札赐王钦若曰：“编修《君臣事迹》官，皆出遴选。……起今后，自初修官至杨亿，各依新式，递相检视，内有脱误，门目不类，年代、帝号失次者，并署历，仍书逐人名下，随卷奏知。异时比较功程等第酬奖，庶分勤惰。委刘承珪专差人置历。”

《册府》的编撰，是靠集体力量而成的。当时王钦若作宰相，所以由他领衔，在学术上真正负责总其事的是杨亿。

杨亿，字大年，“博览强记”，“自幼及终，不离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喜诱诲后进，以成名者甚众。人有片辞可记，必为讽诵。重交游，性耿介，尚名节”。青年时就得到太宗的赏识。淳化中，杨亿时正读书秘书阁，三月苑中曲宴，按旧制，未贴职者不能参与。当时杨亿不能参加，他想办法献给太宗一首诗：“闲戴官花满鬓红，上林丝管侍重瞳，蓬莱咫尺无由到，始信仙凡自不同。”太宗见诗，问有司为什么不召他参加，左右以未贴职对，太宗即以亿直集贤院，当即参加曲宴。事见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并见《宋史》杨传。

杨亿能诗，是北宋初西崑体诗的代表人物，他和钱惟演、刘筠等唱和诗的总集，名《西崑酬唱集》。杨在集的序中说：“余景德中，忝佐修书之任，得接群公之游。时今紫微钱君希圣、秘阁刘君子仪，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希圣，钱惟演字，子仪，刘筠字，他们都是西崑体诗人。诗歌唱和就是修《册府》前后所作。

太宗死后，真宗对他也很信任。修《册府》时，“其序次体制，皆亿所定，群僚分撰篇序，诏经亿审定方用之。”在学术上真宗是依靠他的。

王钦若是有名的奸相，修《册府》由他领衔，而杨亿为人耿介，对他并不附合。王钦若对杨很忌恨，王和依附王的陈彭年，经常和杨作对，屡次在真宗面前毁谤杨亿，杨亿也看不起王。《续通鉴长编》卷78有记载：

亿刚介寡和，在书局，唯与李维、路振、刁衍、陈越、刘筠辈善。当时文士咸赖其品题，或被贬议者，退多怨诽。王钦若骤贵，亿素薄其为人，钦若衔之。陈彭年方以文史售进，忌亿名出己右，相与毁誉于上。上素重亿，未始听也（《宋史》亿传同）。

路振，《宋史》441有传，景德中为编修官，修过《两朝国史》，修过起居注，但并未参加修《册府》。杨亿素薄王钦若为人，王也经常当真宗面前说杨的坏话，但真宗并不轻易听信。

杨性直，尝草制文件，真宗每修改，杨不同意，辄改回。真宗不但不怪他，反称他有“气性”。《续通鉴长编》卷80记载着这件事：

杨亿尝草答契丹书，云。“邻壤交欢”，上自注其侧，作“朽壤”。“鼠壤”、“粪壤”等字，亿遽改为“邻境”。明日，引唐故事，学士草制有所改为不称职，亟求罢，上慰谕之。他日，谓辅臣曰：“杨亿真有气性，不通商量。”

在真宗议册皇后时：

上欲得亿草制，使丁谓谕旨，亿难之。因请三代，（丁）谓曰：“大年勉为此，不忧不富贵。”亿曰：“如此富贵，亦非所愿也。”

大年，杨亿字。丁谓，真宗朝宰相，《宋史》283有传。《宋史·论》曰：“王钦若、丁谓、夏竦，世皆指为奸邪。钦若以赃贿干吏议，其得免者幸矣。然而党恶丑正，几败国家，谓其尤者哉。”这次王钦若以富贵说杨亿，但杨终于不写，真宗也没怪他，“乃命他学士草制”。

杨亿多次违背真宗的旨意，“亿虽频忤旨，恩礼犹不衰”。但因此更引起王钦若的忌恨，“王钦若、陈彭年等深害之，益加譖毁，上意稍怠”。虽然如此，真宗仍是很宽容杨的。一次，国史院进所修《太祖纪》，真宗对其义例提出二十余条意见，告王钦若应当修改，王钦若说：这是杨亿他们所修的。真宗说你不是也参加了吗？真宗并没有因王的诋毁而独责杨亿。

在编修《册府》时，王钦若也是经常把功劳算在自己身上，把错误推给杨亿等人。据《续通鉴长编》卷67记载：

钦若为人倾巧，所修书或当上意，褒赏所及，钦若即自名表首以谢；或谬误有所譖问，则戒书吏称杨亿已下所为以对。同僚皆疾之。

由于王钦若为人这样奸巧，编修官对他都很厌恶，甚至有一次假作王已逝世，让陈越扮作王的尸体，躺在灵床上，另一人扮王妻，在灵旁痛哭，其余同僚都在灵前唱挽歌，以解大家心头愤恨。不想这事被王听到，密奏真宗，将要治罪，幸由宰相王旦主持、周旋，事才寝息。

杨亿本是喜谈谑的人，“凡僚友无不狎侮”（见《宋史》310《王曾传》）。王旦也曾说过杨亿“谓谑过当则恐有之，讪譏之事保其必无也”（见《续通鉴长编》卷83）。可见他是喜诙谐谈笑的人，但他见了王钦若，不但不谈笑，且不愿理他。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王钦若一登场，他必定避出。大中祥符九年

(1016年)，这时《册府》已编完刊印。这年王钦若以太子太保出制杭州，“举朝皆有诗，独亿不作。钦若辞日具奏，诏谕亿令作诗，竟迁延不送”。所以他们当年虽同主管修《册府》事，但二人气不相投。

王钦若奸邪险诈，是有名的“五鬼”之一。据《续通鉴长编》卷78云：

钦若与刘承珪、陈彭年、林特及丁谓等交通，踪迹诡异，时论谓之“五鬼”。

这是在真宗大中祥符五年的记载。真宗的儿子仁宗对王也久有看法，据《宋史》283《王钦若传》称：

仁宗尝谓辅臣曰：“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王曾对曰：“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时谓之‘五鬼’。奸邪险伪，诚如圣谕。”

虽然在真宗时已有“五鬼”之称，但仍让“五鬼”中的三人参加编修《册府》。

真宗不但对“五鬼”中的王钦若较为推重，而且对“五鬼”之一、与王钦若常常一起譖毁杨亿的陈彭年也很赞赏。陈性敏给，博闻强记。他对“仪制沿革、刑名之学，皆所详练”。每有时政大小，真宗则“日有諮访”，陈“应答该辩，一无凝滞，皆与真宗意谐”（《宋史》287《陈彭年传》）。他善于迎合，真宗则倚重他的才能，很多修书事都委任他，且经常夸赞他：“陈彭年勤于笔砚，常日书万字。”又说：“彭年近令编次龙图阁、太清楼书，又赴编修《君臣事迹》所，以备讨论。仍掌三馆检讨，修起居注。凡有询访，应答甚敏，亦不多得也。”真宗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让他参加写序，是

写序的六人之一。

大中祥符六年，真宗以陈彭年为学士，认为别人不能和他相比，特为陈作歌：

六月，以右谏议大夫陈彭年为翰林学士兼龙图阁直学士。学士兼职，自此始。甲戌，上作歌赐彭年，因谓向敏中等曰：“顷命学士，罕曾赐歌诗，彭年不同他人，故有是作。”因曰：“彭年词笔优长，擢居清近，久益谨密，多闻好学，人鲜僭者。平居日写万余言，复精详典礼，深明法令，人或请益，应答如流，皆有依据。常令检讨典故，质正文义，每一事必具载经、史、子、集所出，备而后已。自非强记，何由至此。”

同朝有人称赞陈彭年，真宗表示赞同：

向敏中曰：“彭年兼有器识。”丁谓曰：“彭年全才也，岂但以文雅雍容侍从，至如参酌时务，详求物理，皆出人意表。”上然之，因曰：“详定所事无大小，皆俟彭年裁制而后定，此一司不可废也。往者参酌典礼，虽徧历攸司，而所见皆出胥吏，今已为定式矣。”（以上见《续通鉴长编》卷73、80）。

修书的二十人，大都是擅长文史，知名当时的学者，有的在史馆供职，为国史编修官，有的曾参与撰修历朝实录或起居注。其中尤以陈越、陈从易、刘筠对编修《册府》用力最多。

《宋史》305《刘筠传》称他：工文善诗，最初为杨亿所识拔，后来与杨亿齐名，时号“杨刘”。“预修图经及《册府元龟》，推为精敏”。《宋史》卷441《陈越传》说陈越“预修《册府元龟》，与陈从易、刘筠尤为勤职”。

钱惟演是吴越王钱俶之子。《宋史》317《钱惟演传》云：“预修《册府元龟》，诏与杨亿分为之序。”钱是修序六人之一。

李维是宰相李沆之弟，曾参加修撰《续通典》的工作。夏竦，“资性明敏，好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外，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为文章，典雅藻丽。

真宗对这些学者都很满意，因为他们都是经过真宗自己“遴选”的，是审慎选拔的。

书成之后，凡参加编修此书的编修官，“并加赏赉”，杨亿、刘筠、刁衍、杜镐等很多人都升了官。陈越已于成书前一年卒，无子。真宗特赐越兄陈咸同《三传》出身。

总观当时的种种措施，对编修官的待遇是较优异的，对他们的要求也是严格的，因此，这些御用文人也都谨遵旨意，按着皇帝的意见，进行编纂。

《册府元龟》这部书，可以算做是一部大型的史料分类汇编，所收资料相当丰富，史料价值较高。它把历代事迹，自上古至五代，按历史事件和人物，分门别类，顺序排列，概括全部十七史。虽然所采用材料以十七史为主，间取经、子，不收说部，但对校史、补史、辑佚等工作，仍是很重要的参考书籍。

此书虽与《御览》、《英华》卷数相同，而实际字数却比二书多出数倍。这样一部卷帙巨大的书，又经辗转传抄，校勘不易，文字的脱、衍、缺、倒很多，又因有些人以为书中十七史以外的材料不多，因此过去对这书的重视不够。

就拿清乾隆时四库馆辑薛居正《旧五代史》来说，按成书年代的排列，是：

薛史（974年）—

|             |
|-------------|
| 册府元龟(1005年) |
| 永乐大典(1405年) |

——薛史辑本（1775年）

《永乐大典》后于《册府》四百年，《薛史》大部分材料本可以由《册府》辑出，而因《册府》有印本，《大典》为孤本，是内府所藏，因此辑录时以采用《大典》为主，而《册府》只

可为辅。虽然如此，但是从此《册府》已渐被人注意。

到道光时，扬州岑建功惧盈斋刻《旧唐书》，请刘文淇、毓崧父子及罗士琳、陈立校勘，成《旧唐书校勘记》。刘氏等善用校勘学之他校法，参用《册府》，校勘成绩显著，因此，《册府》的价值，更为人重视。

编修《册府》时，关于唐、五代时事，不仅仅采用了《旧唐书》和《旧五代史》，而且引用了实录。因为修《册府》时，离五代末只有四十多年，离唐亡不及百年，唐、五代各朝实录尚未完全散失，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唐实录就有二十二部，共638卷，五代实录十三部，共257卷，十国实录三部，共130卷。其中唐和五代各帝实录皆存，此外还有《唐太宗建元实迹》、《唐统纪》、《大唐中兴新书纪年》、《唐录政要》、《唐天祐二年日历》、《唐创业起居注》等多种。所以现在《册府》里唐、五代时材料，往往为刘、薛二家书所未载，这些材料，即为当时采自各朝实录等书而来。

就是唐以前的各史，因编《册府》时所使用的都是北宋以前古本，自北宋至今已近千年，各史辗转翻刻，差异谬误，自所难免，所以这十几部史书，都可以用《册府》校勘。

援庵师说：《册府》“可以校史，亦可以补史”。他自己所补《魏书》缺页，就是较著名的例证。

《魏书》写本自唐朝以来，就已有残缺。北宋由刘敞、刘恕、范祖禹等修补、校勘，始有刻本。二刘和范祖禹都是宋代有名史学家，刘恕更对南北朝史事非常精熟，他们对《魏书》作了较细致的校勘、修补。但经靖康之乱，在中原战事中，刻本又有残缺，幸四川未经兵乱，至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收拾补缀，在眉山刊行，将此书与其他六史合刻，称“眉山七史本”，即今所谓“宋蜀大字本”。明、清两代所刻《魏书》，皆出自此本，但此本在元、明二朝也有残缺，故两朝都有补版，即称为“三朝本”。

1935年涵芬楼影印百衲本廿四史时，所用《魏书》即眉山本，实亦即三朝本。但此本涵芬楼只藏有半部，乃向北京图书馆和江安傅氏双鉴楼、吴兴刘氏嘉业堂等各家所藏借得，汇凑而成，故较为完善。但全书仍缺三页，无法补足。所缺即卷108之四《礼志》四、卷109《乐志》及卷111《刑罚志》，各缺一页。

《乐志》缺页，殿本注“缺一版”，因有此三字注，故此缺页向为人注意。但此页亡佚八百载，南宋、元、明、清诸儒从未及见，乾隆时，卢文弨据《通典》补了十六个字，已为难得。

1941年，陈援庵老师将前后内容仔细分析，用《册府》卷567，及《通典》卷143历代制造后魏条，把此缺页补全，共316字。使几百年的缺页复出，当时引起学术界极大注意。

援庵师当即命当时在辅仁大学任教的、他的学生启功同志仿《魏书》原刻本字体，将缺页补抄，栏格与原书一致，字体秀美。援师大喜，石印若干分，急寄涵芬楼主人，并分赠藏有百衲本廿四史的师友、学生，各地藏有百衲本廿四史者，纷纷来信索要，以补全书之缺。

1935年涵芬楼印百衲本廿四史时，此页尚缺，1944年再版重印，已按励耘书屋抄页影印插入全书。《魏书》增补此页后，天衣无缝，极为美观。

自补《魏书》缺页后，更引起文史学者对《册府》的重视，使用《册府》以补史、校史者日多。

《礼志》和《刑罚志》缺页二处，因文字似衔接，且仍连印，未注“缺一页”等类字样，一似并无缺页者，一直未引起人注意。

中华书局点校本亦皆已用《册府》补上，《礼志》据《册府》卷581，共补315字。《刑罚志》据《册府》卷615，共补319字。从此《魏书》三缺页完全补齐。

又如《周书》卷六《武帝纪》下，建德五年十二月诏书，

“是日诏下曰”下注“此下缺”，殿本以下有空白数行。1931年，援师亦据《册府》卷164，补足87字。今点校本亦已添上。

又如《南齐书》卷44《徐孝嗣传》，最后诏文，在“沈文季门世”下注“此下缺”，殿本以下空白纸一页。《册府》卷210《旌表门》记徐孝嗣事，有82字，以之与《南史·徐孝嗣传》相校，文字不同，当是引《南齐书》本传，疑即此页缺文的一部分。

其他如《魏书》卷16《广平王连传》“子谥曰哀王”下，《周书》卷6《武帝纪》下的诏书缺文，皆可用《册府》补足。

至于《旧五代史》辑本缺文，用《册府》可补者更多，不一一列举。

以上是用《册府》补史举例。用《册府》校史，随处皆是。中华书局点校本廿四史，有些书已充分利用《册府》校勘史文，使读不通、看不懂的疑文滞句，得以消难通碍，文句顺达，解决了不少问题。惜十七史中尚有未利用此书者，只有俟诸来日。

《册府》不但可以补史之缺、校史之误，而且可以用史文校《册府》，即援师所说的“可以校史，亦可以史校之”。

二十年代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先生借到北宋刻残本《册府》，以之校明刻本，校至卷517《宪官部·振举门》，见其第14页第1行为“烈祖之勳旧加冠光禄赞冠……”，以下内容，与上页文不对题，知有错简，但宋本、明本相同，无法校出错在何处。乃驰书问我援师。援师看后，仔细推敲，读此页内容，全与“振举”无关，考其上下文义，发现第一句“烈祖之勳旧”，是与前页相连无误，但“加冠”以下，则是另叙一事。且“勳旧”之后，文义亦未完，必是此处有脱漏、错简。几经审核，才了解此页错误情况，找出它的来龙去脉。原来此页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第一行第一句“烈祖之勳旧”一句。这句是接

着前页（13页）之文，是晋天福五年窦贞固奏国忌事中的一句，“勳旧”下有缺文58字，可用本书卷31第16页《帝王部·奉先门》互见之文补足。

第二部分为第一行第二句自“加冠”起，至第17行“军容”止，为此页的绝大部分。这是本书卷577第9页第14行《掌礼部·奏议门》“司徒”下面的脱文，错简到此页，应移回到卷577。

此部分为两段，前段有王奂等十四人议，乃采自《南齐书》九《礼志》上之文，见今《南齐书》点校本第146页。后面伏曼容一段，乃采自《南齐书》十七《舆服志》之文，见今《南齐书》点校本第336页。

第三部分为“军容”下，自“是月”起至页末，是贾玼、刘载状，与本书下页（15页）文字衔接，但无法知道所说的“是月”是指何月。后考出《五代会要》卷17《知班》条，载有贾玼、刘载此状，状系周广顺三年（953年）三月事，则得知《册府》此页的“是月”是“三月”，与下页（15页）中显德五年（958年）日期顺序正合。并因此知《册府》贾玼等此状前，亦必是周广顺三年三月事，故此处承上文称“是月”。

这个考证，解决了傅先生的疑问，他得信后感到意外高兴，认为是“问一得三”，收获很大，对援师更加敬佩。

自《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发表后，曾有人来信问及“得三”是指什么，“得三”只不过言其“一问多得”，其实所得不一定只是三个。

一、知此页第一句后的缺文，可用本书卷31《奉先门》补足。

二、知此页中间一大段是本书卷577第9页第14行“司徒”下脱文，可用此324字补入。

三、知此页中间一大段两部分的出处都在《南齐书》。

四、知贾玼状日期是周广顺三年三月。

推而广之，更可知校勘古书，不能仅用校勘学之对校法，还应同时运用本校、他校及理校法。而且还可以得知宋本《册府》未必尽善。有种种所得，所以说“问一得三”。

这就是《册府》可以之校史，又可以史校之的例证。

又如《册府》卷541《谏诤部·直诤门》第24页第18行，李平上表谏中，“凤服龙骖”下，忽接入元匡事（《册府》“匡”避宋讳作“康”），文不相接，盖有缺文。今考之，其前半李平事系《魏书》65《李平传》之文，“龙骖”下缺李平上表谏文261字。见中华《魏书》点校本1451页。后半为《魏书》77《辛雄传》之文，前缺辛雄谏言及简短叙述约160字。见中华《魏书》点校本1691页。

以上缺文，即可用史书校出，为《册府》改正。

《册府》自编成刊印后，直到明朝末年，黄国琦等以杨慎的校抄本为底本，据孙承宗、曹学佺等九家所藏钞本校勘比对，并由陈龙正、吴伟业、夏允彝等九十余人复校，用了二十多年时间，作了大量工作。后来得到福建巡按李嗣京、建南道胡维霖等人资助，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刊刻印行。自此次刻印后，到清朝初年，虽陆续有补版，但仍源出明底本，并非二刻。今除此明本外，北宋残本尚存五百余卷，约占全书一半稍多。

清光绪间归安陆心源得宋刊残本471卷，以校明本，校出错简、脱文甚多。陆氏校书跋文载《仪顾堂题跋》。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明本已将有脱漏的一百余条据残宋本分别补遗于各卷之末，颇便读者。

但《册府》全书卷帙浩巨，几经传抄，错误难免，其脱漏衍文，错排错简，字句譌误，前后颠倒，无卷不有。其有残宋本者可以宋本校，无宋本各卷，见于十七史者，可以十七史校，十七史不载而本书有互见者，可以本校法互订，此外尚可

用他校法参考诸书，作校订工作。所以此书整理校勘，可作、应作的工作还很多。过去因对这样一部资料宝库，重视不够，自中华影印后，渐为“艺林所重”。

我们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鉴于此书史料丰富，五代前的历朝史事都按部、按门、按类、按年分编，欲查同类史料，只要找出其门类，历代有这问题的材料，就可以大概找到。条理清晰，资料集中，易于查阅，为考史的重要书籍，因倡议对这书进行探索，并希望引起各方对此书的重视。

现在我们收入此论集的有十三位同志撰写的文章，文章是从不同角度对《册府》的分析阐述。有的仅谈一部一门，有的概说全书，有的是学习札记，有的是分析论评。我们将这些文章汇编成这本《册府元龟新探》，作为初编，希望今后能有更多同志对此书作深入研究，如今后再有文章，或将再陆续编辑成集。

我们对这部大书，研究得不深，限于水平，一定有错误和不足之处，谨把我们的学习心得，公于社会，作为引玉之砖，并希望读者给我们提出指正。

本书所收文章，论全书的排在前，分部门的排在后，顺序按《册府》部门排列。

1982年2月写于北京师大